

小,项目的选择,收支的内容都应由市场主体——无数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个人和企业来选择,来决定,这些个人和企业的偏好通过集体决策,形成财政预算,为保证预算的执行不至侵犯市场主体的利益,财政还应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唯有此,才能体现出财政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把它叫做法制也好,民主也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下的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无可例外地需要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不能是纯粹的“公共财政”,财政不能完全从生产领域退出,这是由公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

“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分别是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财政运行模式,“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是两种不同的财政理论学说,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财政理论与财政运行模式是相适应的,但不能是等同的。进一步说,“国家分配论”虽然产生于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也曾有效地指导着计划经济下的财政实践,但它不仅仅是对计划经济下“国家财政”这一运行模式的理论说明,而是对“财政一般”的理论说明,即:它所研究和揭示的是自财政产生和存在以来,各个社会历史形态下其所共有的特性或叫共同的本质,从对“财政特殊”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抽象出财政与国家具有本质联系,这是“国家分配论”的灵魂。因此,“国家财政”只是“国家分配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非它的全部。“国家分配论”的具体表现形式远比“国家财政”丰富得

多,深刻得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国家财政”模式的否定,并不能否定财政与国家的本质联系。另一方面,从“公共财政”和“公共财政论”的关系来看,“公共财政论”是产生并存在于西方市场经济的一种财政理论学说,适用于西方“公共财政”的运行模式,并且也仅是对西方“公共财政”运行模式的理论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论”有其借鉴意义,用以指导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框架,但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框架,不等于把西方的“公共财政论”拿来,正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把“资本主义”拿来。“公共财政”之所以能与“国家分配论”融合,是因为市场经济需要“公共财政”,而市场经济又不能否定财政与国家的本质联系,恰恰在后一点上,“公共财政论”存在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这也是它无法取代“国家分配论”的根本原因。

“公共财政”和“国家分配论”的有机结合,是对“国家分配论”正确性的又一次检验,加进“公共财政”的内容,“国家分配论”更为全面和完整,理论上也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其“财政一般”的普适性也体现得更为透彻和充分。经过有史以来多种财政运行模式的实践说明,“国家分配论”对财政本质问题的研究是深层次的,其结论是不可动摇的。但为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运行实践,“国家分配论”的理论体系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正是在这一点上推动“国家分配论”的深化和发展。

。笔谈之三。

## “国家分配论”与市场逻辑的相容性问题

李 贝

(福建国际企业合作公司副总经理):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国家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国家。首先,国家生活现象的基础是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总和。因此,国家在一切方面就必然要受到客观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其次,社会的性质决定国家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国家性质的转变。最后,社会经济生活对国家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在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政治权力相对于社会有其独立性,对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这种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政

治权力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经济条件决定的。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通过考察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导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本质特征之时,十分强调经济基础对于国家及其政治权力的决定作用,即便国家或政府在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有时确实会干扰经济活动的有效运行也要。

在对“国家分配论”的国家学说基础就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之后,我们对“国家分配论”是否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符这一问题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

在市场运行的常态之下,在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之间,经济管理职能无疑将居于主要地位,因为这从根本上是有利于其政治职能的实现的。在此情形之下,从国家与政府的角度看,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让市场经济尽可能在有效作用范围内

运作,从而它有必要而且一般也能够对自身所具有政治权力的扩张倾向进行约束。我国近来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乃至我国迄今为止的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权力的逐步下放,正是这一方面的佐证。而从市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结成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与经济关系,都将对政府及其政治权力的行使起到影响和制约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一般来说是决定性的。亲历着经济改革进程的人们不难体验到,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意识的逐步增强,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也逐渐发生着变化,对于政府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对于政府干预行为的监督与约束力量正逐步增强。当然,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市场力量对于政府行为的规约还尚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是,从中已经不难看出,只要能够真正全面理解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我们是不会对坚持“国家分配论”与市场逻辑的相容性产生怀疑的。

## 林致远

(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

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意识,因而带有任何性、主观性。其理由在于,国家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拥有者,而政治权力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强大、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决定了统治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必然具有强化运用政治权力的动机,其结果可能会导致国家意志的任意扩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首先,“国家主体”的提法,一方面是相对其所分配的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这个“客体”而言的,更为深层的含义则在于:“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与很多事物发生着必然、稳定的内在联系,但只有与国家的联系才具有最本质的本质联系;因此突出财政活动中的“国家”二字当不为过。从而,也就不能将过去经济建设与财政实践中有过“唯意志论”、瞎指挥的事实,简单归咎于“国家分配论”。

如此说来,该如何看待我国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严重的“唯意志”、瞎指挥的现象呢?这可以从国家及其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国家与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权力所维护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那个“公共利益”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公共利益”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得以实现,那么国家权力就将遵从经济运动规律,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将使得现有的“公共利益”遭到破坏,并可能被一种全新的“公共利

益”所替代,那么国家权力在竭力维护这种“公共利益”的同时,将限制或阻碍发展,即便这种限制和阻碍将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和政治权力的全面瓦解,因为,眼前的既得利益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才是最主要的。

但问题随之而来,社会主义国家所维护的公共利益恰恰就是全社会的根本利益,从而,国家对客观规律的遵从应在情理之中。如此说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屡次出现的不遵从经济与财政运行规律的唯意志、瞎指挥又从何谈起?也许仅仅把原因归结为“对客观规律认识不够”或“经验不足”尚嫌不足。这里试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寻求答案。

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各种社会生产关系与经济关系决定着国家与政治权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视角转向对经济体制的考察上来。有事实表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比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低,有时还会更高一些。基于此认识,有人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动因进行分析后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从外部环境看,我国建国以后一直处于恶劣的国际环境之中,国家的安全成为社会公众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这种环境促使每个人优先努力保证团体的安全,为共同的利益奋斗、奉献,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具有这种特征的经济行为主体——“道德人”的行为方式使计划经济体制存在成为可能。从内部因素看,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资源的有限约束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成为现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的有效发展却又否定了自身赖以存在的两个前提:一方面,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来自外界的威胁逐渐消除,社会公众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老百姓由道德人逐渐还原为关注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发展,部分缓冲了资源的约束,资源在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生存的情况下略有剩余。这样,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两个前提的变更,否定了计划经济体制本身。

由此,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个人经济利益动机的转变导致了固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使得整个社会对原有体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进行严格控制的格局的调整提出要求,政治权力作用程度的减弱与作用范围的收缩已势在必行。但是,政治权力的相对独立性运动经常表现为其存在扩张的趋势,加上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惯性难以在短时期内自发减退和消除。这样,由政府官员直接操作的政治权力所表现出来的违背经济运行规律,从而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并引起人力和物力大量浪费的现象屡有发生就不足为奇了。而造成这些不良后果的政府决策失误、政府行为失当等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唯意志论”、“瞎指挥”的东西。

因此,“唯意志”、“瞎指挥”等国家主体运用政治权力不当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分配格局和思想认识等多方面的原因,将其归咎于“国家分配论”是欠妥的。